

康德学的另一版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康德形象

莫 斌

[摘 要]百余年以来对康德及其思想的注目,形成了一片星罗棋布的康德思想研究簇。这种研究簇所产生的著述学说、思想流派、话语形态构成康德学的基本表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康德形象呈现了康德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图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看”,可体现另一种对康德的“近”。以亲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式,可体现一种“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康德”。康德的星云假说不仅在天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辩证法在自然界的运用提供了例证。要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运用辩证法,而康德哲学在这方面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康德学;自然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实践哲学

[作者简介]莫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副编审。

[中图分类号]B01;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5)03-0143-07 [收稿日期]2024-12-20

康德哲学在中国现当代思想语境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位置;康德思想成为中国学人进入、攀登并翻越西方思想的一座高山。对康德思想的研究也一直呈现出不同的面相,这种面相聚焦成“康德学”一词。百余年以来对康德及其思想的注目,形成了一片星罗棋布的康德思想研究簇。这种研究簇所产生的著述学说、思想流派、话语形态构成康德学的基本表征。康德学同时也成为“古今中西”问题的一个影子。^①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而康德始终是德国古典哲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康德与马克思的关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被视为同样重要的思想母题与方法。如果把目光再聚焦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伴随着一种近康德还是近黑格尔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内部无论有多少思想的张力,始终以一种复调的方式助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深化与拓展。这一话题直到最近,仍是学者所关注的重大学术史议题。^②首先,这种“近”的方法论,是靠近康德抑或黑格尔的方式,通过作为他者的德国古典哲学来“看”马克思。而本文尝试一种视角的转化,所呈现的是康德学的另一版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康德形象。其次,基于工作关系,2024 年为了筹备纪念康德诞辰 300 周年的稿件,笔者曾策划“经典作家是如何看康德思想”这一选题。笔者在工作实践及文献检索中发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注康德还是偏少,更多是关注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康德形象究竟如何,是否能带来一些理论阐释空间的增量,是否有若干值得关注的命题或问题,这是本文将要思索和探究的主要话题。正如赵敦华所言,西方哲学处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思想历程和辩证关系^③,在哲学的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中去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新形态^④。

①参见莫斌:《康德的多重面孔》,《哲学分析》2024 年第 6 期。基于百余年康德研究史线索及研究主体的分析,“康德”至少有三种面孔(自然科学的“赛先生”,教化的道德哲人,社会科学化的思想家),三类形象在康德学条目下以复调的形式出现。我们对康德思想的历史形态、当下形态与未来形态的考量,在非西方文明传统中去领会康德思想,这是康德学生命力与开放性的体现。

②参见胡传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系统考察——缘起、实质与跨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作者通过对这一问题史的精致梳理与应答,比较明确地提出,康德与黑格尔的对立最初是黑格尔造就的,康德哲学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二元论的标签也是黑格尔塑造的。但如果把这种标签过于机械地理解为对立模式,显然既不符合康德哲学,也不符合黑格尔的意图。

③参见赵敦华:《马克思和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康德或黑格尔”问题》,《探索与争鸣》2024 年第 9 期。作者着重提出,俞吾金强调康德的重要性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处境化具有全局性意义。

④莫斌:《与世界哲学深入对话——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6 月 14 日。

一、星云假说与康德自然哲学的世界意义

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同时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康德的新哲学与新思想作为对实在的理性之领会,上升为绝对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首次对自身加以反思,并建构一种关于人与人类历史的普遍理论或话语。这种话语虽然扎根于德意志特殊的文化背景,但努力向上升华为一种对人性的普遍性反思。^① 康德学说的世界科学史意义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足够肯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康德作为自然哲人的形象体现在,基于现代科学发展史,康德曾作为重要的科学家与思想家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比如,马克思在论及拉格朗日的数学贡献时就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演进打比方。拉格朗日直接继承泰勒定理,一方面是牛顿—莱布尼茨时期的后继者已经向他提供了改正了的版本,另一方面,拉格朗日正是在泰勒公式的代数化中创造了自己的“导”函数理论。这个过程好比费希特继承康德,谢林继承费希特,黑格尔继承谢林,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均曾研究过康德思想的一般基础,即唯心主义本身;否则他们就不能进一步发展康德的唯心主义。^②

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到,康德的星云说比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更具有历史感,因为它承认自然界的时间发展。康德的这一理论不仅在天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辩证法在自然界的运用提供了一个例证。“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认为只是‘精神’才有历史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③可以说,康德的星云假说理论所呈现的思想力量,在于将太阳系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个历史过程,打破了牛顿理论的封闭性。同时,康德对太阳系演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太阳系毁灭的观点,推动了对天体系统周期的探索,特别是深化了对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研究。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可以肯定的是,就回到真正思考问题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人们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④达朗贝尔曾对18世纪以来人类的知性活动作如下刻画: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的历史到昆虫的历史,自然哲学历经了革命,并且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面目一新。18世纪哲学不满足于将牛顿物理学的“分析”仅仅局限在数学与物理学领域,而是将“分析”看作是一般思考所必需的思想工具。^⑤“虽然自然界明显地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这一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⑥

在康德看来,“根据理性的要求,每种自然学说最终都必须向自然科学进发并在那里完成自身,因为法则的那种必然性与自然(本质)的概念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要作彻底的理解……所以,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按其

①参见贝尔纳·布尔乔亚:《德国古典哲学》,邓刚译,高宣扬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②参见马克思:《数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页。

⑤参见恩斯特·卡西尔:《启蒙运动的哲学》,李日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3页。

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①。这种因理性而称义表征着理性含义的变化,借助牛顿自然科学方法的加持,宛如给盲人送去拐杖,思想家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并能够对自然之内核触手可及。理性的力量不是去超越经验世界,而是自由自在地悠游在经验之中。理性被当作一种力量,而不再被视为先于经验而显示事物本质的天生观念的总和。理性的效能在于把一切经验性材料都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分析成最终的信念与知识因子,为后续的理性建筑术工作打下基础。^②

自然是有历史的自然,自然界如同人类的精神,也是有其发展史的。“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③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及大自然在人类自由的演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奇迹”:“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④基于这种大自然的计划,人类就有理由可以希冀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人类物种从长远看来,就在其中表现为他们怎样努力使自己终于上升到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大自然所安置在他们身上的全部萌芽都可以充分地发展出来,而他们的使命也就可以在大地之上得到实现。”^⑤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能真正地领会康德自然哲学所带来的理论效应,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所作的积极评价。“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⑥所以说,康德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在于“它推翻了牛顿关于太阳系自从被上帝第一次推动以后就永恒不变的唯心论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而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客观物质的历史发展过程”^⑦。

二、康德分析方法背后的自然与辩证法

重新检视康德的方法论遗产,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康德的分析方法。上文论述康德自然哲学的部分,重点谈及了牛顿的思想史效应。而更高的哲学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形象与指引:知识最大可能的确定性所遵循的方法,使得学术风格获得一种规定性,进而使得各种意见不再变幻无常,“就像在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方法把物理学假设的无拘无束改变成为一种遵照经验和几何学的可靠程序一样”^⑧。

“多年来,我的哲学思考曾转向一切可能的方面。……最后,我终于确信了那种为了避免认识的幻象就必须遵循的方法。……所有的这些努力,主要都是为了寻求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哲学的独特方法。”^⑨方法论是促成知识的逻辑完善性的手段。“作为科学的知识必须按照一种方法来安排。因为科学是一个作为体系,而不仅仅是作为集合的知识整体。……如今,知识的最根本的逻辑完善性之一就在于知识的清晰性、缜密性和成为一门科学的整体的系统安排。”^⑩相对于前文作为逻辑学家的康德对自己方法的论述,我们能发现另外一个版本即作为先验哲学家与形而上学家的康德。作为先验哲学家的康德重点关注理性能力的批判与建构,在此基础上,理性的思想实验就是按照牛顿等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理性必须在其一切活动中都把自己置于批判之下,而且理性不能在不损害自身和不引起一种不利于它的嫌疑的情况之下通过任何禁令破坏这种批判的自由”,所以,康德“就把先验的方法论理解为对纯粹理性的一个完备系统的诸

①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②参见恩斯特·卡西尔:《启蒙运动的哲学》,第10—11页。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7页。

④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页。

⑤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2页。

⑦汪子嵩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9页。

⑧《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

⑨《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⑩《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形式条件的规定。我们将按照这个意图来讨论纯粹理性的训练、纯粹理性的法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最后是纯粹理性的历史”。^①

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着重提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暗示了康德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章节里提出:“现在我们是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②“我们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使人误入歧途的谬论。”“它的实质就是: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③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继续以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举例论证:“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知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知性所不清楚的事情。”“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④

从以上材料表明,对于作为逻辑学家的康德与作为先验哲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康德,马克思更倾向于前一个康德。这个话题涉及一部分对辩证法的进一步思考,但更重要的是自然与自由的关系探索背后的唯物史观分析。其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二,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并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其三,德国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滞后,与康德和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关,马克思通过对其背后原因的理论分析与超越,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框架。

“辩证法的第二种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有了开头,因为即使把刚才提到的新康德主义除外,回到康德去又重新成为时髦。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首创者以来,他在自然科学家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这两个假说就是先前曾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起源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没有这两个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简直就不能前进一步。但是,自从黑格尔著作中已提出一个虽然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阐发的、却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纲要以后,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康德的二律背反并没有解决人类知性的“彼岸”问题,而是将其留给了后人。恩格斯认为,康德哲学在某些方面是矛盾的,例如他对“自在之物”的探讨,既承认其存在,又认为人类对其无法完全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曾经被认为是“自在之物”的事物已经被人类所认识和理解,“自在之物”的黑箱是可以被打开的。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提出,可以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9、5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6、21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0、2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15—1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77页。

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①恩格斯认为,康德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辩证法的大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在形式上是唯心的,但其实质内容却具有历史感,这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批判和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强调,要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运用辩证法,而康德哲学在这方面提供了启示。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表明,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归根结底是辩证地发生的,过去那种机械的、不从联系和发展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已经动摇了。^②辩证法是运动的,是不断地接近并达到真实的过程。“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③恩格斯通过批判带有若干康德色彩的杜林的先验主义,科学地阐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④恩格斯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出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

三、实践哲学中的哲学革命

康德提出:“我们经过了启蒙的时代的理性鉴赏力大概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假定,只能发现很少一些人,对了解地球还处于他们视野之外的其他地区所拥有的自然奇异现象漠不关心。”^⑤这种对自然与历史的关切,被康德落实到实践领域的探究中。“纯粹实践理性的真正动力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无非就是纯粹道德法则自身,只要后者让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的超感性存在的崇高性,并且从主观方面在人之中产生了对人自己高级天职的敬重。”^⑥实践哲学中的“绝命命令”在于人人皆有的先验特征,这种无条件的善良意志学说把道德原则看作是普遍的和先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紧紧抓住了“思维与存在”“观念与现实”这两个维度,分析指出18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无法提供实践的主体与环境。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当时的德国市民所处的历史阶段使其无法从实践理性中结出康德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善果。德国市民只能在头脑中产生抽象的“善良意志”,而无法在现实中提供一种与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匹配的实践理性。

“上个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征服了欧洲大陆……而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产生了‘善良意志’。康德以单纯的‘善良意志’自慰,哪怕这种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也心安理得,他把这种善良意志的实现、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康德的这种善良意志完全符合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可悲的状况,他们的狭隘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利益……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小资产阶级的性质。”^⑦康德提出了通过道德法则确定的作为自由的因果性和通过自然法则确立的作为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性。“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既然已由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争辩的法则证明,它构成了纯粹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496页。

②参见汪子嵩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第1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8页。

⑤《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页。

⑥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112页。

甚至思辨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顶石”,而其他诸如上帝概念和不朽概念均依附于自由概念,且与自由一并获得安定和客观实在性。^①然而,“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我们又在康德那里发现了。……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的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意识形态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由于德国的经济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所以市民们只把这些形式当作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因此他们对待这些形式远比其他民族彬彬有礼和漠然置之,也就是说,他们表现出非常独特的褊狭性,并且他们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②

俞吾金在对康德实践哲学概念的研究中明确提出,康德对“技术地实践的”活动(“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划分,是西方实践概念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事件之一。但康德的综合工作并没有弥合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他的善良意志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只能被推到彼岸世界。这具体呈现为,由于康德坚持的是先验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自由观念,所以他对“技术地实践的”活动的范围的理解过于宽泛,而对“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范围的理解又过于狭窄。^③康德的道德哲学并没有获得其现实性,所以其实践性也没有降落人间。康德的世界主义理想和世界公民愿景,在全球化大生产与世界历史进程中也仅仅是理想和愿景而已。由此就能理解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④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指出:“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随同发生的是德国的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纪末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⑤虽然“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在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⑥。关于如何产生能够阐释德国历史与现状的政治经济学,其中的原理及方法,涉及康德与黑格尔对庸俗的沃尔夫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基于这一德国思维经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这成为实践哲学中的哲学革命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中。”^⑦“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进展是如此连贯,如此合乎逻辑,也许我可以说,是如此必然,以致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体系外,其他任何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黑格尔虽然知识渊博、思想深邃,却过分埋头于抽象问题,忽略了使自己摆脱他那个时代——旧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复辟的时代——的偏见。”^⑧从存在的角度而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从认识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一定可以被认识的,根本不存在无法认识的“物自体”。所以,“在古典哲学的各种残余中,只有某种新康德主义得以幸存,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终结论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

①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13、114页。

③参见俞吾金:《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0页。

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最终的结果就是理论思维现在处处表现出杂乱无章”^①。

可以看到,康德实践哲学中关于人性论的论述,提倡克服“根本恶”的思想革命,落实到培养“人格的尊严”等等,对于全球化带来进步和冲突的今天而言,更有助于保持人类的希望和定力。^② 这种希望和定力源自传统,源自我们对自然与自由的重新阐释与理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③

“一切知识及其整体都必须符合一个规则的(无规则性同时就是无理性)。但是这个规则要么是风格的规则(自由的),要么是方法的规则(强制)。”^④本文从康德哲学在中国现当代思想语境中的重要性入手,通过文献分析和工作实践心得,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康德思想的关注度,并尝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角重新审视康德哲学。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看”,体现另一种对康德的“近”。以亲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式,体现一种“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康德”,并由此获得一连串的家族相似概念群,如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康德解释,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康德学,等等。康德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双重性:康德思想既有其在自然科学和方法论上的积极贡献,也有其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的局限性。由于康德的实践哲学未能弥合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故其道德哲学亦缺乏现实性。整个研究值得思索或展望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视角来理解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康德的评价,呈现了康德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图景。

Another Version of Kantian Studies: The Image of Kant in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MO Bi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attention paid to Kant and his ideas has formed a constellation of research on Kantian thought. The resulting publication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discourses constitute the manifestation of Kantian studies. The image of Kant presented by Marx and Engels reflects the role of Kantian though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 another form of “proximity” to Kant is revealed. By approaching Marx and Engels, we can understand a “Kant close to Marx and Engels.” Kant’s nebular hypothesis is not on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stronomy, but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s in nature.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society, dialectics must be applied, and Kantian philosophy offers insights in this regard.

Key Words: Kantian studies; natural philosophy; Marx; Engels; dialectics; practical philosophy

[责任编辑:何石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75页。
②参见赵敦华:《马克思和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康德或黑格尔”问题》,《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9期。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④《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138页。